

张瑜 记录城市野生动物生活史

文 王小梁



张瑜左 与本文作者 摄影 蔡明仪

张瑜,人称“章鱼哥”,微博上有百余万“粉丝”,自诩为“热爱自然的疯子”。能疯到什么程度呢?他可以每天观察啄木鸟育雏几个小时,让机警的鸟都习惯了他在的存在,放心地在他身边自在生活;他能让蝙蝠、红角鸮擦着自己的头皮擦过去,在他眼前捕甲虫;两只黄鼠狼可以当着他的面儿打架,从远处追到近处,再“噌噌”打到树上……

第一次遇见,张瑜被一群人围着,正手舞足蹈地讲绿头鸭找对象的事儿。我离得太远,但这个鼓着腮帮子,一会儿瞪眼,一会儿缩脖子学鸭子的人,模仿得太传神了,让我觉得鸭子都不如他有趣。

第二次见张瑜,是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。他提前发定位,说自己在那儿蹲守花栗鼠,中午才能结束,之前需要“禁言”。我本着观摩“科学怪人”的好奇心,在公园里走了半个小时。随着导航结束,小河边一眼就发现了一身儿绿的他。因为地方太偏,我们用目光隔着河打了招呼。

据说一上午花栗鼠都没出现,所以张瑜先开口说话了。我们坐在河边的石头上,他一边回答问题,一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。一会儿两只苍鹭从我们身旁飞过去,一会儿他像被定住一样对我说:“你听,翠鸟叫。”我的眼睛正找着翠鸟,他突然从石头上滑下去了,整个人缩在地上,仰着头,像是从自己怀里掏出一只手,缩着胳膊,伸出一根手指,指向前方的树冠,轻声说:“你看,那儿有只雀鹰在吃猎物。”

接下来,一边藏着,一边采访,一边观察,一边聊天。

观察山鸫、螳螂 开启多样化快乐

眼前的张瑜就是个“行走的表情包”,聊起家门口小动物的私密生活,他的脸先进入了表演状态。尽管张瑜始终说自己内向,但只要是他熟悉的动物,直接滔滔不绝活色生香。

我们都在童年养小鸭子时犯过严重错误,以为鸭子会游泳,一直在水里没事,而把它们忘记在水盆里酿成悲剧。不同的是,他更细致地观察和了解动物,我则始终陷于悲伤和自责之中。

喜欢动物,大多是天生的。读高二时,张瑜拥有了一台望远镜,他带着望远镜骑自行车去郊外观鸟。在水田见到一只黑翅长脚鹬,他能激动半天;看到数千只红嘴鸥在鱼塘上空盘旋,他感觉置身仙境。随着记录本上鸟名的增加,他的“胃口”越来越大。读研究生后,他到了更远的地方——去海南研究山鸫,在霸王岭自然保护区的山里一住就是半年多。

保护区里只有几个护林员和负责养路的工作人员,他们平日上班,周末回家,经常只剩下张瑜一个人,他倒很享受这份孤独。方圆二十多公里都是森林,张瑜的工作就是抓一种小型鸡——海南山鸫,给它套上发射器,追踪、调查它的生境。虽然每天都要自己砍柴做饭,烧水洗澡,但张瑜觉得人生真幸福。他用空油



张瑜接受采访 摄影 蔡明仪

张瑜

在北京的天津人,生态摄影师、科学绘图师。硕士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专业鸟类学研究方向。常年致力于观察、记录城市动物生活。自称“热爱自然的疯子”。

瓶子养了四十多只螳螂,一个个瓶子整齐地排列在床上。以至于导师来找他时吓了一跳,一个能让螳螂睡在床上,自己打地铺的学生,实在太罕见了。

在海南保护区,张瑜白天观测鸟,晚上回来做晚饭、写日记。因为电压不稳,房间里的灯忽亮忽暗,突然很亮的时候,就会有很多虫子飞进来。他干脆自己逮虫子喂螳螂,天天观察这些“昆虫大侠”。

在张瑜看来,通过慢观察的方式,能感受到自然本身的节奏。小时候,他也在家养过螳螂,看它们生擒蚱蜢、斩首飞蝗、截获蜘蛛。久而久之,这种人类刻意营造的冲突让他感到厌倦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在家门前发现一只螳螂正小心翼翼地逼近一只苍蝇。螳螂时而疾步,时而静伏,根据苍蝇的变化调整狩猎策略,最后瞬间出击,将苍蝇一招毙命。这次“观战”让他体会到了大自然本身的魅力。

记录城市里的野生动物生活史成为张瑜的副业。他觉得,身边最常见的动物一样很值得持续观察。他不追求走得更远、看得更多,而是安心守着附近的一群绿头鸭、几只松鼠,也一样心满意足。观察自然,能让他以最慵懒的方式收获多样化的快乐。

最喜欢“大俗鸟” 帮绿头鸭搬家

网上流传一张鸭妈妈带着小鸭子排成一列纵队,昂首挺胸横穿马路,机动车整齐让道的照片,那是张瑜拍下的瞬间。张瑜说,他最喜欢的就是“大俗鸟”——绿头鸭。

也许是儿时对鸭子的执念,张瑜观察绿头

鸭的生活史用了很长时间,他不但能吹口哨模仿鸭子求偶,还能展示各种鸭子一般的舞蹈动作,这都是靠全情投入的热爱和天生细致的观察力得来的成果。能吸引他的,是鸭子们的爱情剧,在河面上极尽可能地表演,看着就那么高兴。但要说最爱的,张瑜认为还是打戏。有时候两个情敌在水面上围着转,“嘎嘎嘎嘎”互相骂骂咧咧,骂不够,就升级为打、抽。张瑜看着水花四溅,不停按快门记录下来,心里大呼过瘾。鸭子身上没有“杀伤性武器”,彼此造成了不了什么伤害,基本上不见血,而且打着打着也就散了。但对张瑜来说,真是“读你千遍也不厌倦”。

2020年6月,小区池塘的鸭妈妈突然决定带着小鸭子们搬家,前往距离池塘近千米的另一片水域,中途要经过一条车流密集的马路。张瑜听小区保安说,从早晨5点开始,鸭妈妈就带着小鸭子们出发了,但走了几次都没走成。他们猜测,是鸭妈妈不敢贸然穿越马路。于是张瑜和小区工作人员决定护送这一家鸭子搬家。他用相机记录下那天的画面:鸭妈妈从容地走在马路上,后面跟着一排小鸭子,两边的汽车安静地等候。

在生活中,张瑜没遇到过和自己一样痴迷于观察动物的人,但当他读到奥地利动物学家康拉德·劳伦兹的《雁语者》时,仿佛看到自己“跨时空的镜像”,找到了情感共鸣。书里写:“一个人,只要他目睹了自然界固有的美丽,就再也无法离开。他要么成为诗人,要么成为博物学家。”

身边最常见的动物 同样值得持续观察

城市里生活着很多野生动物,身边最常见的动物,同样最值得持续观察。松鼠是张瑜记录生活史的物种之一,他已经观察了十几年。一般先划分观察区,再给能识别出来的松鼠起个简单粗暴的名字,比如红一、红二、大耳公、大耳母等。

下午踩点儿的时候,张瑜看见一只怀孕的松鼠,从肚子分析,它还有一周就应该生小松鼠了。当时是冬天,眼瞅着松鼠吃冰,张瑜悄悄跟着它回了家——那是一个比较低的油松枝条上的繁殖巢。一般来说,回家时松鼠会采集点儿新鲜的巢材,当天风很大,松鼠挂在树枝上的一条人类破秋裤上撕下一块儿布条,塞进巢里。

几天后下雪了,张瑜想给“孕妇”拍点儿雪景。到树下看一看,树枝已被修剪,掉在地上,松鼠的巢压在下面。“孕妇”临产,不能找到备用巢?松鼠的肚子太大了,活动不灵便,张瑜心急如焚。他把压瘪的巢拿起来,放在松鼠经常活动的地方,想着这样能方便它把旧巢材叼走。接下来,张瑜每隔几天就做一次全天候的观察和寻找。连续一周,没有丝毫收获。

十几天后,一个小身影从张瑜身边闪过。靠直觉,特征像它!重逢后,张瑜发现松鼠肚子瘪了,原来它带着幼崽在一座建筑的排水道口安了新家。松鼠生完幼崽以后,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搬家,因为巢内卫生越来越差,气味重了,天敌会找上门来。松鼠成了张瑜的牵挂,哪怕出差归来,他都会一早就去松鼠窝边守着。那天他守了俩小时,正正常常时间它没出来。张瑜去松鼠的一个觅食地寻找,果然看见它正在撕巢材,填得满嘴都是。他在那一直看到下午,又跟着松鼠妈妈

回家,发现它还住在原来的地方。

天气预报说有雨,结果当晚真的下了雨,且一直没停,张瑜担心松鼠被淹死,一晚上没睡。次日天刚亮,他打车跑过去,发现松鼠妈妈吃了点儿东西,居然去修葺一个喜鹊旧巢。弄了一会儿,又赶回家一只一只叼着幼崽转运。它的脑袋后边,屁股、尾巴都被雨淋湿了,但幼崽们除了尾巴尖,全身基本都是干的。张瑜看到松鼠一家乔迁新居,才彻底放心。他给这只松鼠起名叫“吉亚”。

看不够就继续画 迷恋大自然的魅力

其实张瑜的主业是博物学绘图。这种画源自16世纪的英国,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,博物学绘图一直是记录大自然的重要手段,它将科学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。我看过他的画,每一笔都细腻生动,体现着生态美学。如果要画一株植物,他得提前查看植物有几枚叶片,花药(雄蕊中产生花粉的组织)的着生方式等,创作追求极细致、超准确,画一张图有时候需要一周时间。更令人无奈的是,投入时间和成本不成正比,靠博物学绘图挣钱养家太难了。正因如此,在这个日渐冷门的行当中,张瑜笑称自己属于“冲在第一线的敢死队”。

一位动物摄影师曾说:“你越是觉得了解这个动物,越会发现它能做出令你意想不到的事。”但观察的时间久了,也会有疲劳期,热情减退。怎么保持初心呢?张瑜的方法就是画画。如果不画,一般人看完这只鸟就走了。但是真正想画这只鸟的时候,就必须坐下来,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去观察。被动拉长了时间线以后,就会发现这很有趣。

张瑜说自己“特别尊重尸体”,因为尸体能让他了解更多。尸体是一个实体,让他有三维的认知,这是照片无法替代的。画蝉蜕,他把翅膀翻开以后看各部分的结构,看它们翅膀的功能,翅膀的折叠。身体结构了解得多了,就能对应上它们的行为特点、行为规律。



鸭子排队搬家 摄影 张瑜

张瑜还记得自己最早对待蟋蟀的残忍。蟋蟀是一种很小的蝉,逮着以后它总乱动,张瑜就把它烫死,画完了做成标本。后来他觉得良心受到谴责,标本没做好,还把它给害了,所以就改成了用望远镜真正去观察活体。

如今的“章鱼哥”不网购,不逛商场,很少乘坐公交车、地铁,到哪儿都骑自行车。为了便于观察动物,他在家中阳台上种了荷花、茉莉、多肉植物,植物的“世代交替”帮他踏实感。他还养了几只乌龟,看着它们一动不动地晒太阳,他的心能静下来。他最理想的生活是在大自然里隐居。

讲述

1942年,运送上千名英军战俘的“里斯本丸”在舟山群岛海域沉没 打捞沉于海底的二战记忆

口述 杨怡芬 撰文 何玉新



杨怡芬在作品分享会上

杨怡芬小说《海上繁花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,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事件为基点,塑造了众多血肉丰满、有情有义的人物形象。近日,“海上繁花,二战传奇——中国人民勇敢的心”作品分享会在北京举行。著名学者、作家刘琼,评论家杨庆祥,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与杨怡芬对谈,回顾创作过程,重返历史现场。小说中,杨怡芬以海上浪花的起伏不定暗喻战争风云的波涛汹涌,颂扬了人类同舟共济的可贵精神,同时也对侵略与抗争、生命与尊严等主题进行了理性思考。

发现“地狱航船” 探寻中国人民勇敢的心

我出生在舟山群岛,在税务部门工作,2002年开始写小说。2005年,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,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:1942年9月27日,日本运输船“里斯本丸”搭载778名日军官兵和乘客,以及1816名英军战俘,从香港深水埗码头出发驶向日本。10月1日清晨,途经舟山群岛东极诸岛海域时,因未按国际公约悬挂“红十字”标志,被美军“鲈鱼”号

潜艇发射鱼雷击中。日军多艘船只赶到现场,只撤离了自己人,并将英军战俘强行关在底舱。战俘们撞破舱门冲上甲板,日军开枪射杀多人。附近渔民冒险划舢板救起384名战俘。“里斯本丸”沉没。随后,日军登岛搜捕,有3名战俘在渔民掩护下侥幸脱险。

这件事让我特别震惊,原来在我们这片海域,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,竟也是太平洋战争的战场一隅,与二战历史是相连的。当时那些渔民为什么这么勇敢?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。在我有限的文学阅读里,也未曾读到过与此相关的作品,我觉得或许可以丰富这方面的书写。

“里斯本丸”原是一艘商船,被日军征用加装武器,改装成一艘军用运输船。这类船只被称为“地狱航船”,

在西方历史学界,这是一个与日本战争罪行相关的专有名词——二战期间,日方为弥补国内男性劳动力的不足,将大批盟军战俘由东南亚等地用船运到日本本土。看到这些历史资料,激发了我属于平凡之人的感慨,很想与大家分享。

我的落脚点是人民,写我们中国人民勇敢的心,也写我们中华民族的“仁爱”之心。《论语》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“仁”,这是中国人特别重要的根基。东极诸岛的渔民秉承祖上所传“救人一命,天上一星”的信念搭救战俘,这种高贵品德打动了我。依我的观察,时至今日,每当台风过境,总会有几则暴风雨中渔民互助救援的新闻。我有几回搭朋友的便车回家,我说到某处放我下车就好,对方回应的都是“送佛送到西”,执意送我到家门口,让我心生暖意。这看似平常的处世之心闪耀着人性的之光,成为我写这本书最初的动力。

动笔之前需要搜集资料,网上关于“里斯本丸”的信息都比较简单,而且有不少错误,需要甄别。我又去图书馆查电子资料,到各种图书网站去搜索,找到一本书之后,就可以链接出很多本书。此外还要知晓这片海域的各种抗战力量,甚至包括海盗、土匪结合起来的武装。这些都是基

本史实,但如果光写这些,还不能成为一部具有现代意味的小说,所以我在史实之上进行了虚构。

小说是虚构的文体 但涉及历史也必须准确

写作之初,我有两个选择,一是把这个旧故事再说一遍,另一个是在旧故事里加上新故事。正在犹豫时,我读到了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·弗兰纳根的《深入北方的小路》,说的是修建泰德铁路的澳大利亚战俘的故事。那条铁路被称为“死亡铁路”,由日本在二战期间修建,过程中死了许多工人。这本书明艳与黑暗并置的写法启发了我,让我跃跃欲试,于是选择了新旧结合,在描述营救战俘的同时,穿插了小说的叙述者张明与木村香织的异国恋情。这场恋爱给小说以明艳色彩的同时,也拓宽了时空,从1942年延伸到2017年,呈现出对于战争、仇恨和爱的思考。

我虚构了被渔民搭救的3名战俘之一伊恩和他的妻子、儿女,与他们一家人被战争冲击得七零八落。一个叫阿卷的男孩,目睹父辈们救起在海水里挣扎的战俘,又带着伊恩等人藏到礁石洞里,与他们结下了友情。另一位战俘约翰伊恩幸运,他在战后回到英国开始正常生活,老年时返回舟山寻找记忆,与阿卷重逢。

对于小说家来说,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声音,找到叙述的基调,才可以一直往下走。写1940年到1941年“香港沦陷”那一章时,我想从张爱玲写香港的小说里借鉴一些“氛围感”,可是觉得都不太适合。兜兜转转,终于在项美丽的《香港假日》中找到了战时日常的气息。项美丽亲历了那

一时期的香港,《纽约客》风格的行文细致又准确地书写出她感受到的战争细节。还有关于“重庆陪都”的时代氛围,我从网上翻到了一个美国外交官的回忆文章,以此代入文本。

为什么渔民们敢在日军的枪口下搭救战俘?勇敢和仁爱固然重要,但也是因为在广阔的东海,沿着海岸线,各个港口都有我们的敌后武装力量,持续多年与日军作战。我以运送棉花以及各种物资到敌后的历史资料为切入点,展现出这段抗日战争的光辉历史。

虽然是一个传统故事,但我采用了现代视角,每个人物只讲自己知道的事情,只看到他眼前窄窄的一片。就好像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个手电筒,在暗夜里走路,只能照亮眼前那一小块地方。但如果把很多手电筒集中在一起,那照出来的就会是很大一片光亮。

这是我所有作品中人物死去最多的一个。写作的时候,我常常被黑暗吞噬,有时候写不下去了,那种感觉让我想起一句话:“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,深渊也在凝视你”。我写战争的残酷,为的是呼吁人类要尽最大努力去维护和平。回望抗日战争时期,中国人民的勇敢是低调而实在的,我希望《海上繁花》能记下这些踏实、隐忍的历史细节,也希望可以通过小说的方式,唤起当下人们的自我反省和对和平的珍视。

每个作家都有野心 想创造“小说的宇宙”

写作对我的诱惑之一,是在文字构筑的虚拟世界里,跟某个不知名的读者相遇。我们会互相呼应,我的意识和他的意识在那一刻是相通的。荷兰的电影《盗梦空间》我看了三遍,其中非常打动我的是,如果习惯了虚拟世界,就不

想回到现实生活了,因为虚拟世界太精彩了。这和写小说、打游戏是相通的,虚拟又真实,会让人全心投入进去。

每个作家都有野心,都想创造一个“小说的宇宙”,只是不大好意思说出来。关于二战的书写,放眼全世界,作品非常多,但关注到我们东部沿海的抗战,关注到我们中国和中国的平民百姓的作品并不多见。《海上繁花》的“宇宙”里面,不仅有抗日战争的各种力量,还有抗战时期的民生。作为从战争中走过来的每个人,他们曾经遭遇了什么,是推动我写作的情感力量。这种力量足以支撑我完成小说创作,如果拔高来说,这就是意义感,是这个小说背后的价值所在。

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·门罗在一篇小说里写了一段话,大意是:非常少的人拥有宝藏,这个宝藏就是你的某种天赋,如果你拥有它,一定要紧紧抓住,不要让它中途遇到拦截,让别人把你从你身边夺走。这也是我的一个人生态度。我觉得,虽然我学经济的,虽然我的工作甚至我的人生离文学非常遥远,但是我热爱写作,而且好像有这个天赋,有这个宝藏,所以我就要努力付出,看看自己到底行不行。《海上繁花》就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下完成的。

历史总是干巴巴的,我喜欢浸润了水分的故事,即便明知它掺杂了虚构,或许还夹带着作者的许多“私货”。这部小说最终呈现的,仅有我看到的史料的一部分。毕竟我们都活在网络时代,这是我写这个小说的原因,如果回到几十年前,我恐怕写不了这个小说。

《海上繁花》的书名,一半源自日本江户时期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诗句:“此世,如行走在地狱之上凝视繁花。”这也是我和书中人物一起经历的心境。每本书都有它自己成长的样子,《海上繁花》更接近于蔷薇,热情奔放,温暖相伴。